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古版年画珍本

「天津卷」

主 编 / 王海霞
本卷主编 / 姜彦文

长江出版传媒
湖北美术出版社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中国古版年画珍本「天津卷」

主 编 / 王海霞
本卷主编 / 姜彦文



长江出版传媒
湖北美术出版社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总 策 划 / 王开元

陈高潮

总 顾 问 / 薄松年

主 编 / 王海霞

责任编辑 / 刘 姍

文字编辑 / 陈凌云

整体设计 / 《中国古版年画珍本》项目组

技术编辑 / 李国新

作品拍摄 / 吴 溪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版年画珍本. 天津卷 / 王海霞主编; 姜彦文分卷主编.

--武汉 : 湖北美术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7-5394-7545-5

I. ①中…

II. ①王… ②姜…

III. ①年画—作品集—天津市—近现代

IV. ①J228.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17959号

出版发行: 长江出版传媒 湖北美术出版社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洪山区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

电话: (027)87679520 87679521 87679522

邮政编码: 430070

网址: www.hbapress.com.cn

电子邮箱: hbapress@vip.sina.com

印刷: 深圳华新彩印制版有限公司

开本: 635mm×965mm 1/8

印张: 64

版次: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本卷定价: 880.00元

全套定价: 7800.00元

凡 例

一、本书为《中国古版年画珍本·天津卷》，收录了以天津杨柳青为中心产地的杨柳青木版年画（简称杨柳青年画）代表性作品。本卷不涉及清末、民国以来兴起的、与传统杨柳青年画密切相关的石印、胶印年画。

二、本书选择年画作品时，以“古版”“珍本”为原则，不但注重作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更重视作品的艺术价值；既包括了大量经典之作，也有很多首次刊布的新材料。书中收录了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年画，以王树村先生的藏品（其中的绝大多数目前已转藏于中国美术馆）为主，并适当增补了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艺术研究院、天津博物馆、中央美术学院图书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等单位及个人的藏品。

三、本书内容上分为总序、总论、概说、图版、后记五个部分。总论由丛书主编撰写，概说由分卷主编撰写，其目的是帮助读者从整体上了解中国年画艺术，形成对天津年画的基本认识。图版部分则包括作品的高清图片、基本信息、内容说明三个小板块，对每一幅作品进行全面而细致的介绍，以便读者欣赏，同时加深对年画艺术的了解。

四、为体现杨柳青年画的特点，图版部分的作品共分为六大类：门神门画、故事年画、戏曲年画、仕女娃娃、民俗生活、神像纸马。这里的分类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有些作品的类别已经无从判断，也有作品可能从属于两种或以上的类别。其中，故事、戏曲类作品大致以事情发生的时代先后为序。

五、图版部分中，对作品的基本信息的标注顺序为：作品名称，版刻（或绘制）时代，体裁，制作方式，尺寸，画店名称，作品收藏者或提供者。如：文王爱莲，清代版，贡尖，版印笔绘，纵60厘米、横102厘米，齐健隆，王树村藏。凡标明为王树村、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作品，亦包括天津义成永画店的作品，其尺寸均为画面纵、横的最大值（画芯尺寸，而非整个作品的纸边距）。其他作品的尺寸数据则来自收藏者或提供者。

六、图版部分中，作品的内容说明力求简单明晰，涉及年画的艺术风格、用途等方面。故事、戏曲类年画，还写明其出处。内容相同的年画，前面已有介绍的，后面的内容介绍从略。

总序

王文章

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

历经八年艰苦、细致的搜集、甄别、编纂工作,《中国古版年画珍本》即将正式出版。此时此刻,让我回想起2006年6月初,正当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迎来第一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日的前夕,我接到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著名民间美术学者王树村先生抱病写给我的一封信。信中,先生谈到他看到我国“非遗”保护工作的进展既高兴又焦虑的心情。他指出,“申遗”热潮中,书市上有多种年画出版物系新翻刻,却号称“珍藏本”或“即将消失的民艺”等,冒充文化遗产。他说: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莫如由我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策划、出版一套《中国古版年画宝鉴》,集中将我院图书馆所收藏的年画及我等私人藏品,编印出来,以此作为样板来对照、辨别真假年画,使假李逵让位,让真正的文化遗产面世。”他提出争取尽快编纂出版丛书,还附了一份编纂方案给我,说他愿为此事贡献余生。王树村先生多年来致力于中国年画的收藏和研究,其收藏之丰富,在全国无出其右者;其研究之成果,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肯定。一位八旬老人,重病在身,治疗已使他的身体很是衰弱,但他念兹在兹的仍是以实际的努力,保护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读了他的信和编纂方案,我十分感动。

此后,在先生的指导下,由他的学生、著名民间美术理论家王海霞研究员具体承担起这一工作。王树村先生于2009年仙逝,但这套丛书的编纂工作一直没有停止。在经费和工作条件都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王海霞研究员带领编纂人员心无旁骛,埋头工作。至2009年底,丛书中年画的搜集、甄别、整理和图片的拍摄工作完成了大半;2010年,这套年画丛书由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申报立项,成为北京市重点图书选题;2011年,该项目又由湖北美术出版社和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联合申报国家“十二五”重点出版规划;2012年,又成功列选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并更名为《中国古版年画珍本》,丰富内容,重新编纂,由湖北美术出版社和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联合出版。出版单位组织了精干的编辑力量,为出好丛书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这套丛书的正式出版,不仅是中国年画出版工作的大事,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一项重要成果,我想,以此也可告慰王树村先生在天之灵了。

这套《中国古版年画珍本》丛书,专家学者们通过对所选作品反复比对,精心遴选,收录了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等相关文化机构和中国民间年画研究家、收藏家王树村先生等多位国内外著名年画藏家的3000余幅作品。其中,中国艺术研究院倾其丰富的收藏提供了选编基础。十分可贵的是,

中国国家图书馆提供了珍藏几十年的5000余张古版年画，编纂者从中选取了500张，收录到这套丛书中。该丛书收录的许多珍贵的年画作品都是首次出版。

古版印制的木版年画和明清、民国时期手绘年画的珍贵原作，是这套丛书的主体内容。全书首先突出体现的就是“珍本”的理念，选择的作品都是具有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原作珍品，同时，全书还突出要求编纂的艺术规范。丛书的每卷本都有严谨的学术研究综述，各分卷主编对每一幅作品也都做了详尽的标注和图说，以期让读者对作品的内容、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以及审美价值有准确的解读，从而对中国传统年画有正确而全面的认知。可以说，该丛书不仅是传统年画真正遗产的整体性呈现，也将作为传统年画的“标准件”，为年画艺术的鉴定、恢复和新创作提供十分有价值的参考。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全面开展以来，全国已有二十余个传统年画产地的年画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可见国家对于被称为“中国社会民间生活的图像志”的传统年画遗产的高度重视。随着“非遗”保护工作的不断深入，一些埋没民间的老画雕版重新被挖掘出来，一些收藏在民间的古版年画和近代早期年画原作也被陆续发现。如近几年发现的数百件山东高密扑灰年画，不少是高密年画历史盛期艺术水准最高的作品。在丛书编纂过程中，还发掘出2000余张北京、天津、河北各地的神像和纸马，印制精美，色彩鲜艳。这些传统年画原件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并体现出很高的艺术水准，难得而又珍贵。

这套丛书的编纂队伍，有年逾八十的著名学者，也有三十来岁的年轻学子，像著名学者薄松年、张红渊等诸位先生，都以权威研究者的深厚造诣，对丛书的编纂做出了重要贡献。参加丛书编纂的工作人员，都是从事民间美术和民间年画研究的专业工作者，他们不辞辛苦，奔赴全国各地实地采访、搜集、甄别、拍摄，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至于那些新发掘、发现的作品，则邀请了国内著名学者逐件鉴定，对其中难以判定的内容，则以实为实，不加枉论，坚持以科学的态度、严谨的学风来客观地呈现这些祖先留下的年画珍本。

我相信，这套《中国古版年画珍本》一定会惠及当代并传诸后世，真正为中国传统年画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发挥有益的作用。

中国社会民间生活的图像志

王海霞

中国艺术研究院民间美术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木版年画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绘画形式之一，有着一千多年的发展历程。清代末年，木版年画遍及除西藏以外的全国各地，重要的年画产地达到二十多个，全国每年生产的年画达到数亿张。年画的题材极为丰富，内容无所不包，被专家们誉为形象地反映中国传统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可以说木版年画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入社会、最生活化的影响巨大的艺术门类。年画还是非常具有国际影响的中国传统民间艺术。世界各国尤其是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日本等国近百年来一直在通过各种方式收集和研究中国传统年画和古老刻版。现在，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纵深发展，年画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受到了高度重视。这套丛书，正是在这一大文化背景下产生的。

这套年画珍本集，经历了很多的挫折和时日，今天得以出版，不仅是民间美术领域的一个重要事件，也实现了为之奋斗一生的我国著名民间美术研究家、收藏家王树村先生生前的愿望。这期间的经历，每每想起，记忆犹新，先生为年画在内的民间美术挖掘、研究而奋斗的一生，让后人感念。

九年前，王树村先生面对在“申遗”热浪中，年画、剪纸、艺匠技法等出版的空前繁闹局面，发现了许多不可忽视的问题，他怀着忧虑的心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2006年6月，他以83岁高龄在写给中国艺术研究院王文章院长的信中说道：“……书市上也有许多年画书出现，遗憾的是皆貌似抢救文化遗产，但都是些并非值得抢救的内容，因这些书多是‘抢购’年画摊上的新翻刻者，或美其名曰‘珍藏本’，或冠以‘即将消失的’……，混淆了‘申遗’的真相。虑及出版之物，艺术水平及是否属于‘遗产’问题，则令人生疑。据我所知，传统的早期木版年画，多半毁于‘文革’。中国艺术研究院及我个人早年收藏的年画，是真正的原作，可谓遗产。但有些年画书籍或丛书的编委多是不精通民间艺术者。倘若所编之年画品类，多半是市上所售之伪劣货色，则对‘申遗’无疑造成不好的影响。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莫如由我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策划、出版一套《中国古版年画宝鉴》，集中将我院图书馆收藏的年画

及我等私人藏品，编印出来，以此作为样板来对照、辨别真假年画，使假李逵让位，让真正的文化遗产面世。我院所藏的资料可贵，正当面世以正视听。”

这套丛书的编纂计划写于2006年6月，由我执笔，基本上体现了王树村先生的设想，写就后呈送给王文章院长，得到了他的重视和支持。之后，王树村先生重病缠身，由于这一工作的复杂性，十分遗憾先生未能亲眼看到他夙愿的实现。

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出版工作受到了空前的重视，湖北美术出版社、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决定联袂出版这套中国古版年画的鸿篇巨制，实是为后人做一件功德无量的工作。它的出版，不仅为中国美术史年画研究提供了最为详实的图像资料，也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古代社会生活提供了一套极为珍贵的图文资料，这也是对王树村先生最好的纪念。

这套丛书采取了分卷编制的方式，按产地分类，共有十一卷：北京卷，天津卷，山东卷(上)，山东卷(下)，山西卷，河北卷，河南卷，陕西卷，江苏、浙江、上海卷，四川、重庆卷，综合卷。

这套丛书所收录的年画作品时限为：上起年画肇始时期的宋金时期，下迄20世纪50年代。年画图版皆标注名称、时代、体裁、制作方式、尺寸等。每幅图版都有解说文字。内容方面，坚持“珍本”的概念，所收录的年画作品皆为各地传统古版年画中具有典型性、代表性，以及具有教育意义、文化价值、审美价值的作品。此外，每卷开卷都有专家撰写的综述文章。

王树村先生生前非常重视年画中的纸马的研究，他写过多篇文章，研究这种被称为“百份”“甲马”的民间神像，因为它最直接和形象地反映了黎民百姓的宗教信仰，传达了其心理深层的文化诉求。在这套丛书中，我们特地遴选了各地的纸马中有典型性的作品，其中不少是以前没有发表过，没有受到重视

的作品，其价值不言而喻。

在文稿的撰写中，我们注重以下四个方面：

1. 从文化史和艺术发展史视角，按照年画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进行审视和描述，力争全面勾勒出年画独有的文化面貌。
2. 注重年画不同时代的变化和发展，对其背后的民俗文化内涵、审美意蕴、艺术成就和历史背景等，作出客观的交代。
3. 每卷本按年画不同题材分类，各分卷的介绍凸显本卷地域文化特点。对相同题材的作品，从造型艺术的丰富性出发，分而述之，关注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4. 年画作者多为民间艺人，画面所题文字难免存在衍夺窜讹的问题，为便于阅读和查考，均以规范的文字呈现。图版的内容说明，因地域、风俗及传承差异，为尊重民间艺术生态的多样性，对涉及的人名、故事等不作硬性统一。

年画是民间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民间美术的最大一宗。它是我国传统绘画之山水、花鸟等画种日益兴盛，人物画逐渐衰落之际新兴起来的一个画种，借助年俗文化而发展，又借助雕版印刷术的广泛运用而普及到城乡各地，其表现内容无所不包，渗透到世俗生活的各个领域。在过去，中国民众的文化生活最为重要的两个事项就是听戏和赏画，所赏之画主要是每年更换一次的年画。年画和戏里好看好听的故事，牵动着人们的心，所谓“画中要有戏，百看才不腻”，说的就是民间年画的魅力。画里有说不尽的千秋事，有道不完的人间情。它是百姓学习知识的教科书，也是人们了解世事的窗口。年画的价值，正在于它不是宫廷少数统治者的艺术和文人雅士的个人情感的抒发，它表达的是社会最为广大的民众集体的信仰、观念和情感，而这正是认识和了解中国社会的形象的资料，是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

但是，长期以来，年画艺术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与其创作者和主要使用者的低下地位有着密切关系。早在年画艺术形成的宋代，标榜“轩冕才能、岩穴上士”的文人画家与出身卑微的画院众工、民间艺人之间就地位悬殊，对立分明。因而皇族出身的郭若虚在其画论《图画见闻志》中称：“凡画

必周气韵，方号世珍。不尔，虽竭巧思，止同众工之事，虽曰画而非画。”郭若虚还将画家按朝代分为上中下三等。宋代的三等分别是：上等，王公、士大夫；中等，高尚其事，以画自娱者；下等，业于绘事，靠作画为生的画师艺匠。另一位宋代画论家邓椿，在其所著《画继》中将绘画艺术按尊贵程度排列了次序，由高到低分别是：圣艺、侯王贵戚、轩冕才贤、缙绅韦布、道人衲子、世胄妇女。民间艺匠如同附录一般，置于世胄妇女之后，这实际上还是推崇统治者和士大夫画家，贬低工技画师。我国绘画史上士大夫和以卖画为生的民间画师地位高下之分，由此可见。

此后，历代有关画史的论著中，民间画工始终处于遭贬的境地。不仅如此，在明代，画家（即便是名家）作画，如果“入时人之眼”，为民间年画作坊刻印出版而广为流传，也会遭到文人评论家的藐视。明代翰林院孔目、绘画评论家何良俊便公然贬斥蒋三松、张平山等名家“最入时人之眼”的作品，称“此等虽用以揩抹，犹惧辱吾之几榻也”。

回顾年画艺术的发展历程，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为什么年画艺术虽为封建文人所不齿，却赢得千百万城乡民众的钟爱，以至绵延千余载而不衰，反而渗透到城乡各个角落，成为广大人民点缀岁时节令的必备品？以描绘往昔事实、英雄楷模、世俗生活为主的年画艺术在民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主要是由于它在功能方面上承古代“指鉴贤愚、发明治乱”之图画要旨，在技艺方面则下传六法和线描人物画之技艺，既继承和光大了传统的民族绘画，又形成了适合自身生存的艺术特色。正因为如此，当元明之际传统人物画衰落中断后，北宋以来宫廷“院画”的工笔重彩人物画传统还能在年画尤其是天津杨柳青年画中得到完整的保留。

我国古代的绘画大多以人物画为主。最早的品画名著《古画品录》的作者、南朝萧齐时人谢赫在论及绘画的功能时指出：“图绘者，莫不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古代绘画是形象地载录历代兴替和人类文化与文明发展的重要手段，而这种载录的目的，在于“明劝戒”“兴教化”。其要旨已为民间年画所吸收，其题材也为年画所继承，并依据时代的特点予以补

充、拓展。年画始终扎根于城乡的平民大众之中，努力从世俗民风中挖掘丰富的素材，以表现民众的喜怒哀乐，讴歌传统美德，揭露社会弊端……使广大民众于年画艺术的欣赏中获得美而有益的享受，从而喜爱年画，自觉地接受其传统民族文化内涵的熏陶。

因此，从年画艺术在绘画要旨、技法两方面对民族绘画传统的传承来看，称年画艺术为我国民族绘画传统之正宗，并不过分。

年画的题材，与现实社会息息相关。它追述“往昔事实”，褒贬历史人物，向人民灌输了爱国主义、民族传统文化思想；它描绘了太平盛世人民安居乐业的生活，也展示了社会动乱状态下人民流离失所的悲惨情景；它细腻地刻画了岁时节庆、婚丧嫁娶等平凡而又精彩热烈的世俗生活，为终年操劳的平民百姓享受短暂的年节欢乐增添了光彩；它寓教于画，将几千年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等内容，浓缩到一幅幅构思巧妙的图画之中，成为贫苦的樵子农夫启蒙教育的百科全书。“消寒图”“耕织图”等形式的历画，成为向农民群众提供有关农事节气、生产操作知识的科普读物和工具书；“二十四孝”年画又在倡导孝道的同时，传播了“百善孝为先”的中国传统孝亲文化……

年画艺术形象直观、通俗易懂，为民众所熟悉。广大人民群众常常从中发现自己的“影子”，从而喜爱它，将它当作自己岁时节庆、世俗生活的精神食粮。年画艺术极强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根植于民间大众的生活，反映了生活的真实，表达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年画艺术在描绘现实生活的同时，不忘将历史、文学、宗教等融为一体，艺术地将它们与世俗生活有机地结合起来。它杂糅儒、释、道和原始宗教、神话传说，赋予各类神祇以世俗形象，甚至以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取代宗教诸神。如以唐代秦叔宝、尉迟恭等名将取代传说中的神荼、郁垒为门神，将唐代道士孙思邈尊奉为与神农、扁鹊同列的药王，等等。

年画艺术还不失诙谐幽默，富有极高的创造性。如对于民众信奉的神灵，它也进行了善意的调侃，于是有了《打灶王》《闹门神》等戏曲年画。它还幽默地为灶神改名易姓、“婚配”妻妾，乃至创建灶王府邸，增置属神；为捉鬼的猛神钟馗添了一位乘轿出嫁的窈窕小妹。

在咸丰十年（1860年）山东画坊刻绘的《释道治鬼图》里，年画艺术将现实生活中的中华民族反抗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焚烧圆明园的正义斗争，以神话方式描绘为佛祖如来和太上老君率八位弟子痛击三只花猪（寓意侵略者），起到了唤醒和鼓舞民众团结爱国、共御外侮的宣传作用。此图以抽象表现具体的浪漫主义手笔，还为苏州桃花坞、山东潍坊、天津杨柳青、安徽芜湖、福建漳州、陕西凤翔、河北武强及上海等地刻印的反帝和革命战争题材的年画的发展，开辟了新路。

综合上述情况，不难看出，年画艺术既富于现实特征，又饱含浪漫色彩，这二者的有机统一使年画的艺术特色更加显著，作品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

当然，年画艺术的价值，远远不止上述几个方面，它的起源、发展及衍变的过程，与人民的经济生活、风俗习惯、居室格局、区域环境、审美要求、宗教信仰、民族精神、爱国思想等密切相关。因此，对年画艺术的研究，小而言之，将有益于了解中国社会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了解年画与文人画的区别，时局变化对年画的破坏或推动作用等，从而勾勒出年画艺术的发展概貌，填补我国美术史上的空白；大而言之，年画就是一部中国社会民间生活的图像志，也是留给后代的一部形象的史书。

目 录

001 天津年画概说

029 门神门画

087 故事年画

231 戏曲年画

297 仕女娃娃

349 民俗生活

449 神像纸马

天津年画概说

姜彦文

“年画”¹是民间美术的主要品类之一，其历史非常悠久。明清以来，民间年画呈现出全面繁盛的局面，产地遍及全国，不同风格、不同题材、不同体裁的年画争芳斗艳，蔚为大观。过去人们在欢度春节之时，家家户户从大门到住室都要贴年画，把环境装饰得焕然一新。“年画”一词最早见于清末李光庭所著的《乡言解颐》，其中“贴年画”被列为“新年十事”之一。²当时的情景，在同为清末人的富察敦崇撰写的《燕京岁时记》中可见一斑：“每至腊月，繁盛之区，支搭席棚，售卖画片。妇女儿童争购之。亦所以点缀年华也。”³（图1）后来，郑振铎先生也认为，年画“是在新年的时候粘贴于门上、室内墙壁上作为装饰品之用的”，以使家庭里“现出无限的生气与喜悦”。⁴笔者以为，这恐怕是对狭义的“年画”概念最为妥帖的解说。⁵



图1 清末摆地摊的年画艺人（采自仇润喜：《邮筒里的老天津》，天津：天津杨柳青画社，2004年，第201页）

年画寄托着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愿望，既满足了广大民众的审美要求，又传播了历史文化和道德观念，凝聚了民间艺人的智慧和才能，堪称我国传统美术园地中的一朵奇葩。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年画逐渐淡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需要“抢救”和“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此同时，其文化价值却更加鲜明地彰显出来。有识之士早已发现，年画是记录一个民族的图像史书，是难得的历史学、民俗学、社会学的形象史料，其在美术史上的独特价值更不容忽视。

1. 对于“年画”概念的系统讨论，参见[日]三山陵：《“年画”概念的变迁——从混乱到误用的固定》，韩冰译，《中国版画研究》（日中艺术研究会刊）2007年2月第5号，第173—193页。

2. 原文称：“扫舍之后，便贴年画，稚子之戏耳。”参见[清]李光庭：《乡言解颐》，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66页。

3. [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北京：北京出版社，1961年，第90页。

4. 郑振铎：《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211、212页。

5. 本文所讨论的“民间年画”却又不限于此，而是包括了更多的体裁。参见本文的第五节。



图2 天后圣母神祇(采自天津博物馆:《沽上风物:天津民间艺术陈列》,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15页)

天津近京畿,邻渤海,为九河下梢之地,除了与京城文化关系密切之外,又是运河文化与海洋文化兼具之地。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带来商业贸易的繁荣,以及独特的天津文化与民俗。(图2)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天津成为最早与西方文明接触且深受影响的中国城市之一,引领了中国的近代文明。因此,在晚清民国时期的天津民间美术中,也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多元文化影响。(图3)

天津地区的民间美术非常繁盛,举凡泥人、风筝、刻砖、剪纸、玩具等品类,无不广受赞誉,尤以年画最为著名。本文所讨论的天津年画,即以天津杨柳青¹为中心产地的杨柳青木版年画²(简称“杨柳青年画”)。因本套丛书的规范与要求(古版、珍本)所限,清末民国以来兴起的石印、胶印年画,虽然与传统杨柳青年画密切相关,但并不在本文的论述范围之内。传统杨柳青年画始于明末,盛于清,至民国时期始渐衰落。杨柳青年画题材广泛,内容多样,表现了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充满了浓厚的生活与时代气息,并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在制作上,杨柳青年画采用了印绘结合的表现方法,吸收了北方版画与院体工笔画的艺术特色,具有精细、明丽和典雅的艺术风格。

本文主要分为七个部分,分别探讨了杨柳青年画的“收集与研究”“起源”“历史与风格”“作坊与流布”“体裁与题材”“制作技艺”“画师与刻工”七个议题,力图简明扼要地勾勒出天津杨柳青年画的基本面貌。



图3 杨柳青年画《万国铁桥》(采自天津博物馆:《沽上风物:天津民间艺术陈列》,第18页)

1. 需要说明的是:杨柳青在汉代为渤海郡章武县地,隋唐两代隶属河北鲁城县(乾符县),金代河北东路武清县在此设柳口镇,元明两代分隶于武清、静海县,清代至民国时期隶属天津县。1948年底解放,设杨柳青市,旋废市改镇,隶属天津县。1949年10月升为河北省辖镇,亦为天津专员公署驻地。1954年改为静海县辖镇。1960年,划入天津市南开区。1962年划入西郊区。(参见天津市西青区地方志编委会:《西青区志》,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102页。)就是说,历史上的“杨柳青”与“天津”很多时候并非隶属关系。目前我们通常所说的“天津杨柳青”,应理解为“今天津市的杨柳青镇”。

2. 木版印刷是杨柳青年画生产的一个主要步骤和手段,但亦有一些未借助木版的纯手绘作品。

对民间年画的收集与研究最早是由一些外国学者开始的。因此，很多国家都藏有数量不等的清代至民国时期的中国年画，如俄罗斯、德国、法国、英国、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瑞典、丹麦、波兰、捷克、美国、日本、拉脱维亚、格鲁吉亚等国¹。

国外收藏中国年画最多的国家是俄罗斯，共有大约6000余幅，并且“因为俄国主要与中国北部发生联系，所以收藏最多的是杨柳青年画”²。其中科马罗夫（1869—1945）（图4）和阿理克（1881—1951，旧译“阿列克谢耶夫”）（图5）二人的收藏较为系统和全面。俄国植物学家科马罗夫于1896年至1897年两次到中国，工作之余，收集了大约300幅年画（这些作品大部分是杨柳青年画）。后来，他还用这些年画在圣彼得堡俄国地理学会举办了一次展览。虽然“汉学家们不屑一顾的态度说明这些东西毫无用处”³，但当时正在彼得堡大学东方系一年级就读的大学生阿理克正是因为这个展览，而对年画产生了兴趣。1906年，阿理克来北京进修，开始搜集年画，三年内共得3000种。⁴他对年画非常喜爱，在杨柳青旅行的日记中曾经这样写道：“说实在的，我不知道世界上哪一个民族能像中国人民一样用如此朴实无华的图画充分地表现自己。”⁵在收集的同时，他还请人对这些年画的内容、含义以及使用规范做了大量的记录。在这些珍贵的实物资料和调查实录的基础上，阿理克对他收藏的年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著述颇丰。正如李福清（1932—2012）先生所言，阿氏的贡献不止于是“中国年画收藏方面贡献最大者”，他还“举办了世界上第一次中国民间年画大型展览”，是“世界上第一个对中国民间年画进行科学研究的人”⁶。

1907年5月，阿理克在北京遇到了法国汉学家沙畹（1865—1918），并开始一同旅行。在天津，因为受到阿理克的影响，沙畹也收集了一批杨柳青年画，主要是戏曲年画。⁷

法籍传教士亨利·多雷（1859—1931）也可称为“最早收集、整理、研究和摹绘出版年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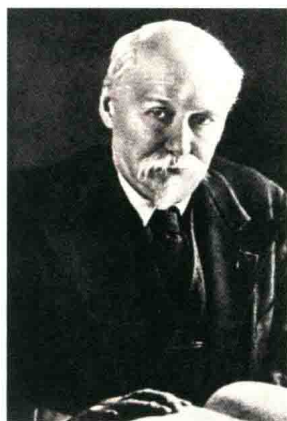


图4 科马罗夫像（采自[俄]李福清：《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俄罗斯藏品卷》，第448页）



图5 阿理克像（采自《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俄罗斯藏品卷》，第450页）

1. [俄]李福清：《中国木版年画在俄罗斯》，阎国栋译，选自李福清：《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俄罗斯藏品卷》，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01页。早在20世纪60年代，山东大学关德栋教授就曾建议李福清出一本中国年画目录，而他特别希望“中国学者编出一本全国所藏中国年画目录，而且最好是图录”，那样，他就会即刻着手编纂苏联及其他国家所藏中国年画的目录。但遗憾的是，他的中国同行们总是缺乏这样的魄力和决心，以及更关键的坚持。而他却早已经着手，并已初见规模。（参见李福清：《1990年中国民间年画的新发现》，选自《民间文学论坛》1990年5期，第9、10页。）2011年，在接受南开大学阎国栋先生的采访时，李福清说他的一个未了心愿就是编写一部《中国年画图录》，“因为这都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可以在此基础上做有价值的科学研究”。（参见阎国栋：《李福清通讯院士访谈录》，选自《中华读书报》2001年6月2日。）同年11月，李福清在“中国木版年画国际论坛”的发言也是关于欧洲收藏中国年画的调查与发现。发言结束后的当天晚上，笔者对他做了一个访问，李先生表示，他的调查还在继续。（参见姜彦文：《“调查年画是我自己的兴趣”——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院士访谈录》，选自冯骥才：《年画研究2012》，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2年10月，第34—39页。）遗憾的是，2012年10月3日，李福清先生因病去世。这是世界汉学界的损失，而李先生关于中国年画的调查计划也就此搁浅。

2. [俄]李福清：《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俄罗斯藏品卷》，第8页。

3. 参见《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俄罗斯藏品卷》，第448页。

4. 参见《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俄罗斯藏品卷》，第8页。

5. [俄]米·瓦·阿列克谢耶夫：《1907年中国纪行》，阎国栋译，昆明：云南出版社，2001年，第23页。

6. [俄]李福清：《中国木版年画在俄罗斯》，选自《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俄罗斯藏品卷》，第405、462、494页。在这篇文章中，李福清用很大的篇幅详细论述了阿理克的收藏与研究。

7. “令人遗憾的是，自1978年沙畹的戏出年画集出版之后，他收集的几乎所有年画都失窃了。”选自《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俄罗斯藏品卷》，第453页。